

“两个结合”：本真意涵、历史脉络和相互关系

汪信砚

摘要 人们将习近平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概括为“两个结合”，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相抵牾，也是对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的严重误读。当我们用“两个结合”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两个结合”的本真意涵只能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此相关，人们关于新时代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转变的断言，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事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确曾有过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转变，但其发生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早期阶段，即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到毛泽东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在“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也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目的；“第二个结合”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更好地实现“第一个结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中国具体实际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5-00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ZX001)

近年来，“两个结合”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学界围绕着“两个结合”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虽然这类研究和讨论凸显了“两个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但其中充满了概念的混乱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事实的漠视，它们使“两个结合”的许多相关问题都晦暗不明。本文拟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史实，厘清“两个结合”的本真意涵，探析“两个结合”形成的历史脉络，辨明“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关系，澄清人们对“两个结合”相关问题的误读。

一、“两个结合”的本真意涵

2021年，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P483)，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尔后，人们便把习近平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概括为“两个结合”，并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分别称为“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认为“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和飞跃。然而这一概括本身是很成问题的，它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相抵牾，也是对习近平上述重要论述的严重误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这一本质规定是由毛泽东明确阐述的。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2](P111-112)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表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P534)。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更为完备的阐述,强调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3](P611)。此后很长时期内,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一般都是将其表述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讨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P557)。至此,毛泽东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为完备的表述,准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回答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他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它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要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首先必须使其在中国具体化,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合中国实际,适应中国实际的特点和要求,特别是要使其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34)。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658-659)正是在这段表述中,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编纂《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本人亲笔将这段表述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3](P534)。不论毛泽东作出这一修订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一修订无疑使得上述引文中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本来就不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它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说明。

二是使中国的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如果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那么使中国的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则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通过对中国的丰富实际的研究,来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的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本质上是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要求人们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6](P374)1942年2月,毛泽东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7](P813)。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全面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丰富内涵。毛泽东之所以把中国具体实际称为“丰富的实际”,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可区分为两大方面:一是中国的现实实际。中国的现实实际就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状况及发展态势,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因此在不

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中国实际称为“中国具体实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现实实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革命实际;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实实际又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建设实际。因此,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中国的现实实际”这一概念,但他经常用中国的“革命实际”和“建设实际”来指称不同时期中国的现实实际。二是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31](P533-534)毛泽东所说的“珍贵品”,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历史实际之所以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它与中国的现实实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时不在影响着中国的现实实际。毛泽东有时把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分别称为“历史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并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31](P534)。因此,他指出,要了解中国具体实际,不仅要懂得今天的中国,还要懂得历史的中国,即要“懂得中国的全部”^[31](P534)。

既然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两个方面,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相应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它既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现实实际,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求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分析和解决中国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要求把中国的现实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创造和不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它同样既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开掘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珍贵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要求把中国的历史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形式,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由上可见,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概括为“两个结合”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的,它们并不是平行或并列的两个“结合”,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两个结合”,这样来概括确实有简明扼要的优点。但当我们用“两个结合”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两个结合”就不应是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只能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同时,由于这里所说的中国的历史实际主要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两个结合”也可以表述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是“两个结合”的本真意涵。

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概括为“两个结合”,也是对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的严重误读。其实,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所作的这一重要论述,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规定的揭示,而是对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的阐释,它旨在说明,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换言之,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并不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两个不同的“结合”,而是将本来包含在前一个“结合”中的后一个“结合”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这一重要论述指出,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的高度自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实践的省思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同时,这一重要论述强调,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和主要着力点上。至于

为什么要这样突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特殊重要性,这个问题留待下文阐释。总之,通过这一重要论述,习近平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了新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方向。

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

在近年来学界关于“两个结合”的研究中,人们在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恰当地概括为“两个结合”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转变作了误判。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以往人们只讲“一个结合”,而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才提出了“两个结合”,因此,新时代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转变。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明确提出和成功实践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为此进行了艰难探索,因而是“一个结合”即“第一个结合”的杰出代表。有的人甚至把新时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都称为“一个结合”或“第一个结合”的历史,并具体考察了它的演进过程。其言下之意是,新时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是没有“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和实践的。由于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概括为“两个结合”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相抵牾也不符合习近平这一论述的根本旨趣,更由于毛泽东早就明确阐述了本真意义上的“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断言新时代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转变,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事实。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确曾有过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发展,只不过其内容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只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到同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是从只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到同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时间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新时代前后,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的早期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启的。五四运动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的译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辩驳,等等。其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辩驳,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是西方近现代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竞技场,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思想大论战,而贯穿其中的根本主题则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时代大问题。在这些思想大论战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有力批驳和战胜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深刻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论证了中国应该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始终是中国面临的时代中心问题,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实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紧密结合这一中国的现实实际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众所周知,上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都曾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旗手和“总司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高举“科学”“民主”旗帜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最鲜明的特征是激进地反传统。因此,上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其中,以陈独秀最为极端。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都是一个典型的全盘西化论者,以至于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梁漱溟称赞他为“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的人。梁漱溟在其1921年出版并提出了一套完整全盘西化理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到民国九年看见《新青年》六卷一号陈独秀君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说他们杂志同人所有的罪案不过是拥护德赛两位先生——Democracy, Science——罢了。西洋能从黑暗到光明世界的,就是这两位先生,他们认定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一切黑暗的也只有这两位先生。我常说中国讲维新讲西学几十年乃至革命共和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作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现在陈君这个话就是把他们看通了的窍指示把大家了。”^[8](P32-33)而陈独秀之所以会“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就是因为他是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认为陈独秀只是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主张全盘西化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即使是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在发表于1923、1924年《前锋》上题目均为《国学》的文章中,他甚至讽刺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主张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9](P432),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斥之为“粪秽”。他说:“‘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9](P543)

虽然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不像陈独秀那样极端,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持否定态度。其中,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它们“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10](P308-309)。瞿秋白则把东方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宗法文化,把西方文化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11](P14)。在他看来,“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12](P213),因而都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是应该淘汰的东西。

上述表明,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缺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维度的,就是说,他们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仅限于“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关于这一点,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能说明问题。李达不只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甚至比陈独秀更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19年6月就开始从日本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最为深刻。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李达并没有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那样明确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当时他同样也没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与之相结合的中国具体实际中。及至1923年,李达明确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13](P108),而他所说的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实行”,是指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因而仍限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这样的“一个结合”。

毛泽东明确意识到并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缺陷。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而且也强调了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必须总结和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1](P534)孔子、孙中山分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代和近代的代表或象征。因此,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再清晰不过地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发展。实际上,早在从理论上强调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化遗产、明确阐述“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思想发展之前,毛泽东于1937年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已经在实践上实现了“两个结合”。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文本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两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深刻揭示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及其克服途径。另一方面,“两论”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两论”是“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总之,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即从只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到同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发展。正因为毛泽东重视并实现了“两个结合”,所以他才得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三、“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关系

在近年来学界关于“两个结合”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关于“两个结合”的关系的探讨。但是,由于人们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概括为“两个结合”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的,所以以这一概括为前提所作的关于“两个结合”关系的探讨必然也是不得要领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属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作不同的“两个结合”,然后再谈论似乎是两个平行或并列的“结合”之间的关系,不仅必然充满理论上的混乱,而且还会严重遮蔽“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际,既然“两个结合”的本真意涵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两个结合”的关系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也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目的。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时代中心问题和中国最大的现实实际。冯契先生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解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奴役?一百年来的志士仁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前仆后继。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引导我们这个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关于‘古今、中西’的论争,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44]就“向西方学习”而言,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他们的带动下,求进步的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向西方学习,赴西方国家和日本留学的人也数量惊人。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并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实践都相继失败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反而还在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各

种西方学说逐渐产生了越来越深重的怀疑。最后,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启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问题,探寻“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并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15](P1471)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

就“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逐渐形成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冲击惊醒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朝上国”的迷梦,而中体西用论就是人们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最初回应,其要义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也就是在不触动中国的旧“体”即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器用,晚清时期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是这种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实践。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中体西用论的破产,表明仅在器物层面用西学补充一下中学是行不通的,必须对中学作根本的改造,于是,许多人纷纷转向“西化”论。至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明确主张全盘西化论,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向封建旧文化发起了挑战。不过,即使是在五四时期,这种全盘西化论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激烈批评,以至于胡适不得不把他主张的“全盘西化”修正为“充分世界化”^[16](P411-412)。随着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增多,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西方社会各种问题的暴露,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幻想逐渐破灭,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其真实写照。此后,人们提出了各种形式的中西互补论。例如,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国不能追随西方文明的旧路径,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驾乎欧美之上”^[17](P753)。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中西互补论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明确主张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化遗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奠定了思想基础。

上述可见,无论是中国人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逐渐形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都是为了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是为了服务中国的现实实际。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进行“第二个结合”,必然也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即实现“第一个结合”,特别是为了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个结合”的直接目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和“中国的特性”,使其成为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P534)。因为只有这种包含着本民族独特智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人的接受心理和真正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人们探寻和解答“中国向何处去”、实现“第一个结合”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的现实实际即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服务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克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缺陷、补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他们那里所缺少的重要维度,强调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化遗产即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P534)。毛泽东所说的“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亦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两论”等论著中,毛泽东大量援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成功找到了一条“站起来”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期中国的现实实际即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服务的。在这一过程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持续不断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智慧,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新时期的小康社会建设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鲜活例证。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理想,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初级阶段。晚清时期康有为宣扬维新变法,又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对儒家的“大同”和“小康”社会理想进行了改造。儒家的小康思想在中国民间影响至深,反映了中国老

百姓对殷实富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擘画中国式现代化蓝图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将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20世纪末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目标。经过40多年的持续奋斗和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不断学习,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P476)。这一鲜活例证说明,正是在创造性地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下,中华民族成功找到了一条“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当今世界,强国的重要特点和根本标志是综合实力强大,即既要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强,也要文化软实力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硬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不仅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科技和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亟待提升。一方面,我国文化的对内凝聚力和引领力还不够强,文化发展状况离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文化产品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文化的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不强,还面临着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显然,要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补齐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存在的这种短板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党的二十大又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了战略部署。正是为了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战略支撑,习近平就我国文化建设的各种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而“第二个结合”的要求,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指明了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必然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8]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是由“第二个结合”造就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今天,坚持和推进“第二个结合”,就是要继续壮大这一文化生命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领和文化支撑。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把本来包含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特别指出新征程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将“第二个结合”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和主要着力点上的根本原因。

总之,“第二个结合”也是极其重要的,但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更好地实现“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为我们解答“中国向何处去”、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精神指引。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8]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9] 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 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1]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2]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13] 李达全集：第3卷.汪信砚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4] 冯契.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1).
-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胡适文集：第5册.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7] 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17).

The "Two Integrations": Authentic Meaning,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terrelationship

Wang Xiny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that "we must adapt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wo integrations". However, this summary not only contradicts the essential stipul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but also represents a serious misreading of Xi's exposition. When we use the "two integrations" to encapsulate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s authentic meaning should be understood only as adap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current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is regard, the assertion that the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evolved from "one integration" to "two integrations" around the new era is theoretically untenable and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ndeed, a transition from "one integration" to "two integrations" did tak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but it occurred at the early stage of Chinese Marxism, when it evolved from "one integration" by early Chinese Marxists such as Li Dazhao, Chen Duxiu, Li Da and Qu Qiubai to "two integrations" by Mao Zedong. Among the "two integrations", the "first integration" is more fundamental, constituting the core essence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serves a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precisely in its capacity to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rst integration".

Key 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two integration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
- 作者简介 汪信砚，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